

高校英语教材使用及其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张虹, 李会钦, 何晓燕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100089;
西华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2)

摘要:本研究调查了3967名高校英语教师使用教材的情况,并探究影响其教材使用的因素。调查结果显示:1)高校英语教师对于教材使用态度积极,使用教材的能动性较强;2)教师使用教材时最倾向于增加材料,最不倾向于改写教材中的材料与练习活动;3)教师、学生、教学环境、教学效果、考试等因素均对教材使用产生影响;4)教龄短、学历低、职称低、院校层次较低的教师以及大学英语教师的教材使用行为受考试因素影响最显著。基于调查结果,本文对英语教材研究者、教学管理者、高校英语教师和教材出版社提出建议。

关键词: 高校英语教师;英语教材;教材使用;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2021)04-0064-06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3967 university teachers of English use their textbooks and what affects their decisions on the materials us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University teachers of English are positive about their materials use and willing to agentively adapt the materials; 2) For adaptation, they are mostly like to add material rather than rewriting input material or exercises and activities of textbooks; 3) Factors affecting materials use include teachers, students, the milieu of teaching, the effect of teaching, and high-stake tests; and 4) Teachers with less years of teaching, lower educational degrees, lower professional titles, working at lower-rank universities and teaching non-English major courses a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high-stake tests for materials use. The study also offers implications for English language materials researchers, administrators, teachers of English, and publishers.

Key words: university teachers of English; English language materials; materials use; influencing factors

DOI:10.16362/j.cnki.cn61-1023/h.2021.04.011

1. 引言

高校英语教材指供普通高等学校使用的英语教学用书,以及作为教材内容组成部分的教学材料(如教材的配套音视频资源、图册等)(教育部 2019),是高校英语课程的根本和基础。“教材之谓教材离不开其使用逻辑”(安桂清 2019:73)。教材使用(materials use)指学生和教师实际上如何使用教材、与教材进行互动(Graves 2019:338),是教材开发与建设的终极目的(Graves 2019:339),也是教材理念落实的关键,影响课程实施的效果。教材使用过程即是教学过程,包括教学活动实施、教师在教材使用过程中的作用、教材使用的有效性评价等关键问题(毕争 2019:63)。然而,与教材编写和教材分析研究相比,教材使用研究非常少(Garton & Graves 2014:2)。调查教师使用教材的情况可以帮助学界了解教材使用的实然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对于研发高质量教材以及开展相应的教材使用培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对国内高校英语专业和大学英语教师使用教材的实际情况进行广泛调查,从而为高校英语教材使用、

研究、编写与教师发展提供实证支撑与启示。

2. 文献回顾

国外有关教材使用的研究采用不同研究方法展开,主要包括课堂民族志(Duff 1995)和多模态会话分析研究(Kunitz & Marian 2017; Matsumoto 2019)等。比如,Duff(1995)采用课堂民族志方法,解释了匈牙利的沉浸式历史课程会选择哪些材料、放弃哪些材料,并阐释了材料的选择性使用如何影响师生之间的互动。Kunitz & Marian(2017)的研究聚焦学生语言学习行为,考察了瑞典初中英语课堂上学生在准备口头报告时如何使用与任务相关的材料。这些研究虽然考虑了教材如何在课堂中使用,但教材使用并非这些研究的主要内容。

近十年来,国内学者逐渐关注外语教材使用研究,但整体研究不足,且大部分聚焦于中小学教科书的使用(罗少茜、徐鑫 2011;蒋联江等 2020),鲜有研究从全国范围聚焦高校英语教师使用教材的情况。现有相关研究中,有的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从学生视角研究某一套教材的使用情况或某一个(些)学校的教材使用情况(郭

燕、徐锦芬 2013; 张文红、王莹 2021)。比如, 张文红、王莹(2021)调查了某一套教材在一所高校的学生使用效果, 分析学生对英语教材的满意度以及教材在培养学生语言运用能力、英语学术能力、思辨能力方面的作用等。有的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深度探析个案教师使用教材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林娟、战菊 2015; 徐锦芬、范玉梅 2017)。比如, 徐锦芬、范玉梅(2017)从活动理论视角探究了两名大学英语教师实施教材任务的策略、动机及成因。研究发现, 两名教师在教学中都会采取跳过、增加、修改、调整顺序等策略对教材任务进行改编; 她们改编的动机受到多种个人及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

综上, 由于已有量化研究覆盖范围小, 质性研究也主要分析个别教师使用教材的实践, 均较难体现广大高校英语教师使用教材的全貌。目前高校英语教师使用教材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的大规模调查尤为阙如, 不利于揭示我国高校英语教材使用的特点与不足。鉴于此, 本文本着发现真问题的目的, 对全国高校英语教师展开大规模调查, 以期揭示教师在教材使用认知、行为和角色方面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是课题组关于高校英语教材情况调查研究的一部分。在了解高校英语教材存在的问题(张虹等 2021)的基础上, 为了更好地了解高校英语教师使用教材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本研究设定了两个研究问题: 1) 高校英语教师使用教材的现状如何? 2) 教师使用教材受到哪些因素影响?

3.2 调查对象及方法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总表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660	16.6
	女	3307	83.4
教龄	6 年以下	312	7.9
	6~10 年	467	11.8
	11~15 年	762	19.2
	16~20 年	1023	25.8
	20 年以上	1226	30.9
	未填写	177	4.4
职称	初级(助教)	240	6.0
	中级(讲师)	2088	52.6
	高级((助理/副)教授)	1639	41.3
学历	本科	611	15.4
	硕士	3002	75.7
	博士	354	8.9
所在学校类型	985 或 211	575	14.5
	一本	966	24.4
	二本	1788	45.1
	三本	638	16.1
学生类型	英语专业	1454	29.1
	大学英语	2813	70.9

本研究以高校英语专业和大学英语教师为调查对象, 进行了大规模在线问卷调查, 共收回有效问卷 3967 份, 所涉高校涵盖 31 个省级行政区域。其中, 东北地区 676 份, 华北地区 719 份, 华东地区 849 份, 中南地区 592 份, 西南地区 609 份, 西北地区 522 份。高校类型、层次均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调查对象的教龄、学历、职称等结构与高校英语教师队伍整体情况吻合(见表 1)。

3.3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编的《关于本科英语教学所用教材的调查问卷》, 包含个人背景信息、客观题和开放性问题 3 个部分。客观题包括 4 个维度: 教材本体、教材使用、教材培训和教材研究。其中, 教材使用维度包括 3 个子维度, 即教材使用认知、教材使用行为和教师在教材使用中的角色。为确保问卷的有效性, 研究者邀请了 31 位专家和教师(14 位教材、教法研究相关专家, 17 位高校英语教师)对问卷客观题进行打分和反馈, 满分为 10 分。问卷得分平均分为 8.77 分, 表明专家和教师认为问卷编制有效性非常好。研究者使用 SPSS22.0 对量化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4. 研究结果

4.1 高校英语教师使用教材的现状

单一样本 t 检验结果发现(表 2), 高校英语教师在教材使用及其二级指标方面得分均显著高于中值 3, 低于 4(问卷采用五级计分), 表明高校英语教师在教材使用方面的态度较积极。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教材使用二级指标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结果发现 3 个二级指标差异显著($F_{(2, 7932)} = 1736.37, p < 0.001$), 具体表现为: 教材使用认知、教材使用行为倾向两个二级指标得分均显著高于教师在教材使用中的角色认知。教师认为自己的教学体现了教材编写理念($M = 3.79$), 且自己改编后的教材使学生的学习效果更好($M = 3.91$), 均显著高于中值 3($t = 66.24, p < 0.001; t = 75.16, p < 0.001$), 这说明教师能够更主动、有效地使用/改编教材, 这一点在使用角色维度的得分得到印证。比如, 关于教师是否将教材视为“教学的圣经”一题, 教师的得分处于中值水平($M = 2.99, t = -0.43, p > 0.05$), 这说明教师不再将教材视为唯一的权威脚本。

表 2. 教材使用态度描述统计及平均数显著性检验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	t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检验值=3)	(检验值=4)
教材使用		3.79	0.47	1.13	5.00	105.75***	-27.47***
	使用认知	3.85	0.61	1.00	5.00	88.14***	-15.74***
	使用行为	3.84	0.49	1.15	5.00	108.37***	-20.45***
	使用角色	3.07	1.16	1.00	5.00	3.67***	-50.84***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五种主要的教材使用行为(增加、删减、调整顺序、改编练习或活动、改写输入材料)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发现差异极其显著($F_{(4, 15864)} =$

1446.09, $p < 0.001$) (见表3), 进一步成对比较发现, 五种教材改编策略得分情况为: 增加 > 删减 > 调整顺序 > 改编练习或活动 > 改写输入材料。教师在使用教材时最倾向于补充内容, 最不倾向于改写教材已有的输入材料和练习/活动。改编或改写教材内容需要花费教师大量的时间、资源和精力, 对教师本身的要求也很高, 所以教师倾向于不做这方面的改编。

表3. 高校英语教师教材改编策略的差异检验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i>F</i>	成对比较
增加	4.06	0.81	1446.09***	1>2>3>4>5
删减	4.02	0.81		
调整顺序	3.91	0.92		
改编练习或活动	3.62	0.99		
改写输入材料	3.01	1.16		

(注: 1表示增加, 2表示删减, 3表示调整顺序, 4表示改编练习或活动, 5表示改写输入材料)

4.2 高校英语教师使用教材的影响因素

4.2.1 影响因素

已有质性研究表明, 影响教师使用教材的因素包括个人的学术背景和兴趣、教师关于英语教学和学习的信念及考试因素等个体和社会文化因素(徐锦芬、范玉梅 2017:96; 蒋联江等 2020:68)。结合文献与31位专家、教师的意见与建议, 本研究编制问卷时针对教师、学生、环境、考试、教学效果五个方面设置问题。教师因素包括教师个人喜好和自身的教学理念, 学生因素包括学生的语言水平及其需求; 环境因素包括学时、班级规模、课程大纲、时代需求变化等; 教学效果因素即教师改编教材是为了更好地达成教学目标; 考试因素则指教师使用教材受到大规模高利害考试的影响。皮尔逊相关分析发现, 高校英语教师教材使用行为与这五个因素呈显著正相关(表4)。

表4. 教材使用行为与其影响因素的相关检验

	教师因素	学生因素	环境因素	考试因素	教学效果因素
教材使用行为	0.509***	0.638***	0.642***	0.288***	0.656***

以影响因素为自变量, 教材使用行为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发现: 教师、学生、环境、考试、教学效果等五个因素均能显著正向预测教师教材使用行为倾向(表5), 即教师使用教材的行为会受到这五个因素的影响, 这与已有质性研究结果一致。

表5. 教材使用行为与其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i>B</i>	标准错误	Beta	<i>R</i>	<i>R</i> ²	<i>F</i>	<i>t</i> 值
教学效果	0.226	0.008	0.359	0.77	0.59	1120.80***	27.41***
环境因素	0.187	0.012	0.233				15.12***
教师因素	0.083	0.008	0.133				10.62***
学生因素	0.119	0.011	0.169				10.71***
考试因素	0.041	0.005	0.086				8.01***

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这五个影响因素进行差

异显著性检验, 发现差异极其显著($F_{(4, 15864)} = 558.74, p < 0.001$)。进一步成对比较发现, 教学效果 > 学生 > 环境 > 教师 > 考试(表6)。

表6. 高校英语教师教材使用影响因素的差异检验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i>F</i>	成对比较
教师因素	3.67	0.78	558.74***	5>2>3>1>4
学生因素	4.05	0.70		
环境因素	3.98	0.61		
考试因素	3.60	1.02		
教学效果	4.13	0.78		

(注: 1表示教师因素, 2表示学生因素, 3表示环境因素, 4表示考试因素, 5表示教学效果因素)

4.2.2 影响因素之个体差异

高校英语教师教材使用的影响因素存在着性别、教龄、学历、职称、所在院校类型、所教学生类型(英语专业教师与大学英语教师)等方面的差异。

4.2.2.1 不同性别及不同学生类型教师的差异

表7. 教材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性别、学生类型差异检验

	教师因素	学生因素	环境因素	考试因素	教学效果因素
男	3.77(0.76)	3.98(0.70)	3.92(0.64)	3.56(1.05)	4.11(0.81)
女	3.65(0.79)	4.06(0.70)	3.99(0.60)	3.61(1.01)	4.13(0.77)
<i>t</i>	3.66***	-2.71**	-2.62**	-1.18	-0.62
英专	3.67(0.79)	4.05(0.72)	3.94(0.62)	3.51(1.06)	4.19(0.75)
大英	3.66(0.78)	4.04(0.69)	3.99(0.61)	3.64(1.00)	4.10(0.78)
<i>t</i>	0.40	0.39	-2.42*	-3.67***	3.37**

分别以性别和学生类型为自变量, 以教材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教师、学生、环境、考试、教学效果因素为因变量,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见表7), 结果发现: 教材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中教师、学生、环境三因素的性别差异显著, 相较女教师, 男教师教材使用行为更多受教师个人因素影响, 较少受学生、环境等因素影响; 教师的教材使用行为影响因素中环境、考试、教学效果三因素的学生类型差异显著, 相对大学英语教师而言, 英语专业教师的教材使用行为倾向更多受教学效果因素影响, 较少受环境和考试因素影响。

4.2.2.2 不同教龄教师的差异

表8. 教材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教龄差异检验

	6年以下	6~10年	11~15年	16~20年	20年以上	<i>F</i>	多重比较
教师因素	<i>M</i> 3.55	3.74	3.68	3.72	3.62	5.08***	2、3、4>1; 2、4>5
	<i>SD</i> (0.81)	(0.79)	(0.79)	(0.76)	(0.79)		
学生因素	<i>M</i> 4.03	4.09	4.02	4.06	4.03	1.22	
	<i>SD</i> (0.75)	(0.70)	(0.73)	(0.68)	(0.69)		
环境因素	<i>M</i> 3.92	4.04	3.96	4.01	3.94	4.01**	2、4>1、5; 2>3
	<i>SD</i> (0.66)	(0.62)	(0.65)	(0.58)	(0.59)		
考试因素	<i>M</i> 3.66	3.72	3.67	3.62	3.49	6.18***	1、2、3、4>5
	<i>SD</i> (1.02)	(0.99)	(1.00)	(1.01)	(1.04)		
教学效果因素	<i>M</i> 4.00	4.12	4.14	4.13	4.13	1.99	
	<i>SD</i> (0.82)	(0.77)	(0.79)	(0.76)	(0.77)		

(注: 1表示教龄6年以下, 2表示教龄6~10年, 3表示教龄11~15年, 4表示教龄16~20年, 5表示教龄20年以上)

以教龄为自变量, 以教材使用行为影响因素为因变量, 进行单因素 ANOVA 检验(见表8), 结果发现: 教师、

环境、考试三个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教龄差异,学生、教学效果两因素的教龄差异不显著。事后多重比较发现:在教师因素方面,教龄在6~20年的教师得分显著高于教龄6年以下的教师,其中教龄在6~10年、16~20年的教师得分也显著高于教龄20年以上的教师;在环境因素方面,教龄在6~10年、16~20年的教师得分显著高于教龄在6年以下和20年以上的教师,且教龄在6~10年的教师得分也显著高于教龄11~15年的教师;在考试因素方面,教龄在20年以下的教师得分显著高于教龄在20年以上的教师,即相对20年以上教龄的教师,教龄在20年以下的教师的教材使用行为更易受考试因素的影响。

4.2.2.3 不同学历教师的差异

以学历为自变量,以教材使用行为影响因素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ANOVA检验(见表9),结果发现:教师、考试、教学效果三个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学历差异。事后多重比较发现:在教师、教学效果两因素方面,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得分显著高于本科、硕士学历教师,而在考试因素方面博士学历教师得分显著低于本科、硕士学历教师,即相对本科和硕士学历教师来讲,博士学历教师的教材使用行为倾向更易受教师个人因素和教学效果因素的影响,较少受考试因素的影响。

表9. 教材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学历差异检验

	本科 M (SD)	硕士 M (SD)	博士 M (SD)	F	多重比较
教师因素	3.63(0.77)	3.66(0.79)	3.81(0.75)	6.94**	博士>本科、硕士
学生因素	4.06(0.65)	4.04(0.71)	4.11(0.65)	1.85	
环境因素	3.98(0.57)	3.98(0.62)	3.91(0.62)	2.04	
考试因素	3.67(0.97)	3.63(1.00)	3.20(1.14)	30.97***	本科>硕士>博士
教学效果因素	4.11(0.74)	4.11(0.78)	4.28(0.75)	7.66***	博士>本科、硕士

4.2.2.4 不同职称教师的差异

以职称作为自变量,以教材使用行为影响因素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ANOVA检验(见表10),结果发现:教师、考试、教学效果三个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职称差异,学生、环境两因素的职称差异不显著。事后多重比较发现:在教师因素方面,中、高级职称教师得分均显著高于初级职称教师;在考试因素方面初级、中级职称教师得分显著高于高级职称教师;在教学效果方面,高级职称教师得分最高,其次是中级职称教师,初级职称教师得分最低。即相对初级职称教师来讲,中、高级职称教师的教材使用行为更多受教师个人因素和教学效果影响,较少受考试因素影响。

表10. 教材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职称差异检验

	初级 M (SD)	中级 M (SD)	高级 M (SD)	F	多重比较
教师因素	3.52(0.83)	3.67(0.78)	3.68(0.78)	4.53*	中级、高级>初级
学生因素	4.03(0.69)	4.04(0.72)	4.06(0.67)	0.36	
环境因素	3.91(0.62)	3.99(0.62)	3.96(0.60)	2.75	
考试因素	3.78(0.94)	3.64(0.99)	3.52(1.06)	10.57***	初级>中级>高级
教学效果因素	3.96(0.81)	4.10(0.78)	4.18(0.76)	11.28***	高级>中级>初级

4.2.2.5 不同学校类型教师的差异

以学校类型为自变量,以教材使用行为影响因素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ANOVA检验(见表11),结果发现:考试因素存在显著的学校差异,事后多重比较发现,三本>二本>一本>重点院校,即所在学校层次越低的教师使用教材的行为越容易受考试因素影响;而教师、学生、环境、教学效果四因素的学校差异不显著。

表11. 教材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的学校类型差异检验

	重点 M (SD)	一本 M (SD)	二本 M (SD)	三本 M (SD)	F	多重比较
教师因素	3.70 (0.75)	3.70 (0.76)	3.65 (0.79)	3.62 (0.82)	1.97	
学生因素	4.04 (0.69)	4.04 (0.68)	4.04 (0.69)	4.08 (0.73)	0.62	
环境因素	3.93 (0.58)	4.00 (0.60)	3.97 (0.62)	3.99 (0.64)	1.75	
考试因素	3.10 (1.09)	3.53 (1.01)	3.71 (0.98)	3.87 (0.90)	72.64***	三>二>一>重
教学效果因素	4.17 (0.77)	4.10 (0.81)	4.13 (0.75)	4.13 (0.79)	0.98	

(注:一表示一本院校,二表示二本院校,三表示三本院校,重表示重点院校)

5. 讨论

5.1 高校英语教师在教材使用方面已彰显其能动性

分析发现,参与调查的高校英语教师在教材使用方面的态度都较为积极,认为自己的教学体现了所用教材的编写理念,能够自主、有效地采用多种策略改编教材,且改编后的教材能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不再只是照本宣科“教教材”,而是“用教材教”(钟启泉、崔允漷 2003:172;安桂清 2019:69)。本研究发现高校英语教师不再将教材视为“圣经式”脚本,而是会在教材使用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该发现与之前关于中国教师教材观的研究结论不一致。李金云、王嘉毅(2015:31)指出当今中国教师的教材观以“圣经式”为主流,这种教材观是教育的社会控制职能和制度化教育强化的结果,不仅限制了教师教学的个性化和创造性,束缚了学生的学习空间和创造意识,而且割裂了课程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本调查的结果说明高校英语教师相较于其他学科教师的教材观更趋合理,这与近些年高校英语教师所接受的教材与教法培训不无关系。同时,本研究发现也和以往关于高校英语教师使用教材的研究中指出的问题不完全一致。张雪梅(2019:89-90)指出,高校英语教师“在教学中所应作出的动态判断和决策已被善意提供的教参、教案、课件和测试题等取代;在教材实际使用中,部分教师不能充分认识教学目标,没有领会编者的意图,也未能依据学生的特点和需求通过适当增加、删减等方式加工和改编教材,从而无法真正发挥教材对于英语学习的作用”。这一说法与本调查研究发现的教师自我报告的情况不符。在具体的题项中,教师在这些维度的得分均极显著地高于中值3。比如:第4题“我能够说出我目前

所用教材的编写理念或特色”($M=3.93, t=65.91, p<0.001$);第35题“在日常教学中,我会改编(增、减、调、改)教材”($M=3.97, t=75.66, p<0.001$)。教材使用的关键在于教师是否有意识地关注教学目标和学生的经验,并以之为基础反思教材使用的过程(安桂清 2019:73)。数据分析发现,教师会根据教学效果、学生、环境、教师和考试因素积极改编教材,其中教学目标的达成度、学生需求和学生水平等各因素是教师重点关注的方面。值得提出的是,教师在教材使用过程中既要尊重教材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同时需将教材内容与学生需求、教学环境的多样性相结合,从而使教材的意义在其实使用中得以实现。

5.2 高校英语教师合理使用教材的意识和能力亟须改观

教师应成为教学内容的开发者,根据学生需求、基于自身知识与经验对教材进行二次加工与开发(王世伟 2008:16)。以往研究也发现,由于教材很难满足所有教师在具体教学情境中的需求,教师实际上都在对教材做二次开发的工作(国红延、战春燕 2011:71)。本研究发现,教师在进行教材二次开发时最倾向于增加内容,最不倾向于改写输入材料和练习/活动。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有矛盾之处。张虹等(2021:72)通过调查发现,教师普遍认为教材容量大,在有限的课时内无法完成全部教材内容的教学,然而,针对同一群体展开的调查结果发现教师最常采用的改编策略是增加内容(见本文4.1部分)。在实际教学中,诸多教师不依据教材进行改编,而是“完全放弃教材”(Bosompem 2014:106),自己额外补充材料进行教学。导致这一结果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教材内容完全不符合教学需要(如不符合语言学习规律,不满足学生学习的兴趣等),教师不得不重新选材补充。第二,补充教学材料的难度低于改编教材的难度。由于本调查所涉及的课程为大学英语课程和英语专业的语言技能类课程,绝大部分教师使用的是由教学专家编写、专业出版社出版、使用广泛的高质量教材,第二种原因的可能性更大。按照常理推测,寻找全新补充材料的难度应高于改编现有材料,但现实中却相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教师对于自我补充材料的质量、难度、教学目标等要求并不高。我们鼓励教师创造性地使用教材,但是教师自己补充的材料是否能真正满足教学和学生需求,有待进一步研究。

5.3 影响教材使用的考试因素存在个体差异

分析发现,教师、学生、环境、考试、教学效果等五个因素均能显著正向预测教师教材使用行为倾向,即教师的教材使用行为会受到这五个因素的影响。其中,大规模考试(大学英语四、六级或英语专业四、八级)因素虽然在五个因素中排在最后一位,但调查教师的得分极显著地高于中值3($M=3.60, t=37.22, p<0.001$),说明考试对教师使用教材的影响较大。具体而言,大英教师、

较低学历教师、初级职称教师、教龄在20年以下的教师、院校层次较低的教师更易受考试因素影响,通过表1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可以看出,这些教师构成了我国高校英语教师的主体,即总体而言,高校英语教师的教材使用受考试因素影响较大。这一研究发现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已有研究中类似结果,比如中考对英语教学中教材使用会产生较大影响(罗少茜、徐鑫 2011:71-72),考试主宰着教材的使用(刘道义 2020:70)。程晓堂(2002:74)认为“不能一味为了考试的需要对教材内容进行删减”“尤其是不能补充大量的复习题和模拟试题。”以大学英语教材为例,当前教材编写和使用应基于《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考试应该是在最后。但在现实教学中,很多教师将测试放在了教材前面(蔡基刚 2006:60),教材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受考试影响。

6. 结语与启示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呈现了高校英语教师使用教材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对这些研究发现进行了讨论。研究对象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研究结果具有普遍性。本研究是在该领域做的探索性揭示问题的尝试,研究发现和讨论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实践意义。

研究方面:其一,鉴于教材使用受教师、学生、环境等个体和社会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单一的量化研究方法无法深入揭示教材使用的内容、方式等问题,建议未来研究可以更多融合质性研究方法,收集教师和学生使用教材的课堂观察、访谈等质性数据,为教材使用提供更多细节深描和意义阐释;其二,鉴于高校英语教师教材使用行为倾向与教师、学生、环境、考试、教学效果五因素呈显著正相关,未来研究可以对这些因素究竟如何影响教材使用的过程进行深入探析。

实践方面:首先,高校教学管理者一方面应了解一线教师在教材使用过程中面临的困惑和需求,通过构建教材使用共同体等方式切实帮助教师合理使用教材,提升其外语教学能力;另一方面,应审慎考虑是否以考试过级率为考核教师的主要评价指标。有研究表明,学校考核教师的标准会影响教师使用教材的热情(严家丽 2016:54)。其次,教师作为教材使用的“能动者”(agent)(van den Branden 2016:172)以及教材和学生之间的“中介者”(mediator)(McGrath 2002:20),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是教学有机组成的一部分(Bosompem 2014:111),因此,教师应持续学习,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这样,在教材使用中也会相应提升自信心,在使用教材时会更多考虑教学效果和学生因素的影响,而不是更多考虑考试因素。如果合理使用了教材,保证了教学效果,学生通过考试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同时,建议教师学习行动研究和课例研究等教学研究,开展基于课堂的教学研究,将自己使用教材的过程和效果记录下

来,从而更好地反思如何才能更好地使用教材,达到学习效果最优化。再者,教材出版社等相关部门应从教材编写和培训两方面加强把关。在教材编写方面,本研究发现教师最不倾向于做的教材改编策略是改写输入材料和改编教材中的练习或活动,因此,教材编写者和出版社应在教材编写阶段严选输入材料,精心设计教学活动和练习,充分考虑教材的“灵活性”(Cunningsworth 1995:5),以切实提升教材编写水准和适切性,满足不同教师和学生需求;在教材培训方面,应基于需求分析,对教师持续进行教材使用与教学方面更加深入、有针对性的专业培训,提升教师合理使用教材的意识与能力,尤其是如何针对学生水平与需求对教材内容进行合理加工或改编使用。针对易受考试影响的大学英语、低职称、低学历及较低层次院校教师开展的教材使用培训,应着重帮助教师正确认识考试和教材使用的关系,通过提升教师有效使用教材的能力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

参考文献

- [1] Bosompem, E. G. Materials adaptation in Ghana: Teachers' attitudes and practices[A]. In S. Garton & K. Graves (ed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Materials in ELT*[C].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104-120.
- [2] Cunningsworth, A. *Choosing Your Coursebook*[M]. Oxford: Heinemann, 1995.
- [3] Duff, P. An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in immersion classrooms in Hungary[J]. *TESOL Quarterly*, 1995(29): 505-537.
- [4] Garton, S. & K. Graves. Materials in ELT: Current issues[A]. In S. Garton & K. Graves (ed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Materials in ELT*[C].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1-18.
- [5] Graves, K. Recent books on language materials development and analysis[J]. *ELT Journal*, 2019(3): 337-354.
- [6] Kunitz, S. & K. S. Marian. Tracking immanent language learning behavior over time in task-based classroom work[J]. *TESOL Quarterly*, 2017(3): 507-535.
- [7] Matsumoto, Y. Material moments: Teacher and student use of materials in multilingual writing classroom interactions[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9(1): 179-204.
- [8] McGrath, I. *Materials Evaluation and Design for Language Teaching*[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
- [9] van den Branden, K. The role of teachers in task-based language education[J].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16(36): 164-181.
- [10] 安桂清. 教材使用的研究视角与基本逻辑[J]. 课程·教材·教法, 2019(6): 69-74.
- [11] 毕争. “产出导向法”与“任务型教学法”比较: 教学材料设计与使用[J]. 外语教学, 2019(4): 61-65.
- [12] 蔡基刚. 试论影响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监控发展的外部因素[J]. 中国大学教学, 2006(6): 59-61.
- [13] 程晓堂. 英语教材分析与设计[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

- [14] 郭燕, 徐锦芬. 我国大学英语教材使用情况调查研究[J]. 外语学刊, 2013(6): 102-108.
- [15] 国红延, 战春燕. 一项关于大学英语教材对教师专业发展作用的调查研究[J]. 外语界, 2011(4): 67-74.
- [16] 蒋联江, 何琛, 赵以. 教师使用教材图片资源的叙事研究[J]. 全球教育展望, 2020(4): 68-84.
-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Z/OL]. (2019) [2021-06-10]. www.moe.gov.cn/srcsite/A26/moe_714/202001/t20200107_414578.html.
- [18] 李金云, 王嘉毅. 教科书使用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J]. 课程·教材·教法, 2015(12): 29-36.
- [19] 刘道义. 论影响外语教材建设的重要因素[J]. 课程·教材·教法, 2020(2): 64-71.
- [20] 林娟, 战菊. “活动”中的英语写作教材评估与使用——来自高校英语教师的声音[J]. 现代外语, 2015(6): 790-801.
- [21] 罗少茜, 徐鑫. 初中任务型英语教材使用情况的调查与分析[J]. 课程·教材·教法, 2011(3): 69-74.
- [22] 王世伟. 论教师使用教科书的原则: 基于教学关系的思考[J]. 课程·教材·教法, 2008(5): 13-17, 22.
- [23] 徐锦芬, 范玉梅. 大学英语使用教材任务的策略与动机[J]. 现代外语, 2017(1): 91-101.
- [24] 严家丽. 试析影响教师使用教科书水平的因素——基于15位小学数学教师的调查[J]. 数学教育学报, 2016(6): 51-55.
- [25] 张虹, 李会钦, 何晓燕. 我国高校本科英语教材存在的问题调查[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1(1): 65-75.
- [26] 张文红, 王莹. 思辨能力培养与EAP教学的融合——《学术思辨英语》教材的设计理念与使用效果浅析[J]. 外语研究, 2021(2): 64-69, 75.
- [27] 张雪梅. 新时代高校英语教材建设的思考[J]. 外语界, 2019(6): 88-93.
- [28] 钟启泉, 崔允漷. 新课程的理念与创新——师范生读本[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重点课题“北京基础教育外语教材中华文化呈现研究”(项目编号: 19JDYYA002)的阶段性成果, 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外语教育学”建设项目(项目编号: 2020SYLZDXM011)的支持。

作者简介: 张虹,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中心研究员,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外语教育、外语教师教育、外语教材研究。

李会钦(通讯作者),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编辑, 研究方向: 外语教育、外语教材研究。

何晓燕, 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心理发展与教育。

责任编辑 吕生禄